

也许是上了年纪吧,现在时不时会想念小学、中学、大学的同学们,尤其是大学的同班同学。那种回忆带给我的是难以形容的温馨。可惜已有四个大学男生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我在上戏校园度过了四年,学的话剧表演。总觉得我们66届这个班有些特点。比方:三分之一男女同学是从预科升上来的,于是可以想见考生竞争势必又加剧。又比方:男生多半鼻梁高高,因为是准备将来演外国戏的。教我们表演的李志舆老师赫赫有名,出演过许多电影电视中的主角。如:《苦恼的笑》《巴山夜雨》《徐悲鸿》等等,形成他特殊的教学经验。很有意思的是,班上忽地插进来一个“大男孩”,居然还是当过海员的年龄大超我们的调干生。他高高大大的身材,是典型的粗犷的北方汉子。我们都年轻幼稚、不谙世事,常常被这阅历丰富、宣传奇色彩的男人所吸引,醉了一般地跟着他在浴室里大秀美声唱法。那时,公认北京的李光羲音色最美。他迷李不可自拔,随口哼

岁月无情人有情

生活中想不到的事情真多。不是吗?一不留神我就到了“米”寿的年纪,老了,腿不能行,手不能拎,老态龙钟很多事情都做不了,不再参加社会活动了。

想不到岁月无情人有情,40年前我曾执教过的学生邀我参加了他们组织的“重回起跑线,再续同窗情”的淮中75届毕业40周年师生聚会,想不到这些长得又高又有了第三代的学生,还记得曾教授过他们的老师。

回想那个时代,读书无用论还很盛行,我们这些老师动辄得咎。没想到当时的黄毛小儿竟记住了老师的点点滴滴。他们在这个聚会上汇报了他们40年来走过的路,表达了他们感恩之情。

他们多数都经过上山下乡、参军做工的锻炼,不少同学考上大学,出国深造,尽管他们的机遇不同,有人当了公务员,有人当了公司老总,有人当了演员,有人当上了记者,还有人当上了大学教授,还有的是基层劳动者,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祖国建设作出了贡献,没有一个“废品”,这是我们当老师最为欣慰的事。

淮中中学规模较小,每届只有六个班级,想不到40年后,这六个班级的毕业生还能集结到100多位。大家济济一堂交谈,热情腾腾充满青春活力。

在同学举杯敬酒声中,在手机拍照闪光中,我忍不住热泪盈眶,我可爱的学生们啊,在这物欲横流的现实生活中,他们如此重情感,要重回起跑线,他们的激情深深地感染着我,感谢你们让我体会到教师职业的重要。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沉睡的思绪又活跃了起来,如能回到40年前,我还会再当一回教师,感谢——我可爱的学生们。



我的昔日同学

童自荣

几句亦几可乱真,弄得我们昏头昏脑地对眼前的李光羲第二也崇拜得五体投地了。

好了,来说说我们班的女生吧。

我们班有两大美女,是自然美。她们是顾永菲和张明子。

顾永菲是个特别有个性的女生,真是敢作敢为、天不怕地不怕。我看也正是这份个性和气质,以及四年学习表演中打下的扎实基础,还有她个人及她的父母经受住了“文革”中种种痛苦遭遇的磨难,得到了孙道临导演的慧眼赏识,在众多女演员中脱颖而出,当仁不让出演电影《雷雨》中的女主角繁漪。作为同班同学我们都真诚地为她而高兴,而她却并无半点浮躁之色。那回《鲁豫有约》要做我的节目,需另约一男一女俩同班同学“陪绑”。我试着在电话里说出请她帮忙的意思,她爽快地说一口

答应丝毫不提有无劳务费,放下手边的事,飞赴北京为我跑龙套。这就是顾永菲,一个从前因彼此个性迥异和我交往并不太深入的女生。

张明子有着《奥赛罗》中女主角苔丝塔梦娜般的温柔。她的娇小和她的那双眼睛,如公主般惹人怜爱。她是预科升上来的几员女将之一。而一首《我是黑人牙膏》的朗诵,楚楚动人、催人泪下,是她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在校园里当年也颇引人注目。表演老师曾安排我跟她在《枯木逢春》片断小品中,分饰哥哥和妹妹。我在家里是个有妹妹的人,大概因为这个吧,我跟张明子在排练中很自然地确立了兄妹的关系。1967年她和班上柳同子结婚之后双双分配到北京青艺,之后就几乎断了联系。所以,当那一天传来消息说,张明子去拍电影了,而且是农村题材戏《艳阳天》中的团支书,我们都大吃一惊。须知那是在十年动乱中;一个洋气的小姐型的女生居然能被选中拍摄这样一个角色,且是上面有人力排众议力挺她出演。可不管怎么说,我真心诚意从心里恭喜她,亦以为她从此会前途无量。谁知啊正应了那句老古话,一个天大的灾难无情地降临她身上,她的忠实伴侣因患不治之症离她而去。精神支柱倒了,无助的张明子于是带着孩子重返上海。可



惜,期望让生活重新开始的愿望并未实现,相反却是面对一个又一个的陷阱……

赵有亮这个名字响当当,恐怕大家都比较熟悉了,那部《孽债》里的男主角就是他的代表作,他是班上拍电影,拍电视剧最多的一位男生,扮演儒雅以至窝囊的知识分子是他的拿手好戏。可是你绝不会想到,这位在舞台上、屏幕上左右逢源、混得极娴熟的仁兄,生活中有口吃的毛病,然也绝了,只要他人一上了台,立马判若两人,台词溜着呢。这个奇男子,台大哈兮兮的,为人却很透明,正直而善良,从都是当干部的料,从班里干部到后来北京中央实验话剧院的大权亦都放心地交在他手上。他的嗓子条件好,人称“洋铁皮”,声带闭合极佳,使得他声音亮堂,而且经用,决不致沙哑。总记得,他还有个保留节目,声情并茂地朗诵《毛主席在我们中间》,学院接待外宾等大场面常常少不了他的身影,他的绝活。

至于我在班里则算是另类,因为唯有我将来是想从事幕后配音、在棚里演戏的,倒也心平气和、与世无争。当然,大致上我是用功的,因为所学到的技能在以后都用得着。对了,我也有让人羡慕之处,即是我一日三餐可笃悠悠入回民小食堂就餐。

是啊,我和我亲爱的同学们,我们之间条件能力或都有差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我们那时都尽力地学习艺术,尽力地为人民奉献好的艺术,且把这个看作至高无上。我想,有了这个,够了。



缓和情绪的良策

周炳炆

如果有人情绪激动,你可能会用“放松一点”、“安静下来”等语言去宽慰他,诡异的足:这些说法恰恰是最无效的缓和情绪的手段。有报道说人从紧张回复到松弛的状态至少要20-60分钟。另有研究显示,隐藏情绪或者

是硬性地把情绪压制下来,往往会使对方的情绪更坏。

那么,应该说些什么来宽慰情绪激动的人呢?

我曾经有一位办公室的同事,她比较容易紧张,面对工作压力和报表的完成期限,有时午饭也顾不上吃,晚上还要加班。某日我走到她的办公



云南个旧号称锡都,洪荒时代,此地是高山巨谷,森林瀑布。自从采锡以来,千年过去,大山肚子几乎被挖空了,最大的洞可容三辆大卡车并排开进去。资源耗尽,势利眼的资本自然撤出。高速公路转向个旧方向的时候,道路变回了坑坑洼洼的老路。工业萧条了,自然界重新回来,老路两旁一度被遗忘的青山翠谷忽然水落石出,植物、庄稼寂寞地疯长着。秋天,石榴一个一个个出现,红铃铛般地挂在幽暗的树枝间,发出听不到的响声,传递着大地的喜讯。破路尽头,峡谷中的个旧城是一片花花绿绿水泥森林,一头刺青,背脊上林立着各式各样的楼房。个旧地势逼仄,康庄大道很难施展,无法大拆大建,只能修修补补、见缝插针。于是各种建筑物——平房、五层楼,七层楼,二十层楼……清、民国、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21世纪的各种建筑彼此混杂,相安,各种材料奏出的布鲁斯,某种博伊斯所谓的雕塑。我总觉得个旧有点像战后的德国某地,杜塞尔多夫?那里有一群生锈的、废弃了的、高原般的钢铁厂。街道不宽,行人可以随意地过街,很热闹。灯红酒绿后面藏着荒废的车间,矿洞、生锈的材料,渣滓、汽油桶、锅炉、旧铁轨、矿斗、琥珀般的油脂……看上去就像一组组安塞姆·基弗的作品。云庙,精美无比的晚清木雕。一些街区是苏联风格。德国进口的采掘机。有个新建的拱拱飞檐的大殿叫做矿王庙。另一些街区是模仿着城市的乡村。市中心与香港一样时髦,美女如云,部分染着黄头发。周围的高山中住着彝族、苗族、哈尼族……他们偶尔深入个旧,穿着古老的奇装异服,一般都是女子,男子不穿。浓妆艳抹的电视台表扬他们“伟大的朴素”的时候,听起来更像是

一种反讽。山坡上的动物园里有四五种动物。一头肮脏的大象在铁柱后面不停地拱着水泥墙。超现实主义的城市,中国传统、西方工业文明的过期产品以及21世纪的焦虑症、失落感强烈地交织在一起,地隧般密集又风格尖锐。此地的诗人厌恶工业,他们歌颂阳光、山野、土著人的玉米地和荞麦花。20世纪晚期,存在主义被介绍到中国,但没有发生什么影响。倒是象征主义与传统的隐喻思维暗合,深受诗人欢迎。他们喜欢在风花雪月中寻找通感,像博伊斯、杜尚那样在工业文明丑陋坚硬的现成品中寻找新的灵感并未得到呼应,虽然个旧的如此大面积的工业区,足够诞生一打博伊斯油脂或克莱因蓝了。我估计这是由于汉语一向牢固的马其诺防线,这种来自大

地的语言对拔地而起的工业文明有着足够的免疫力,它过去五千年毕竟一直是田园山水诗的生产线。虽然世界已经钢筋水泥化了,诗人们依然无法像劳森伯们那样将废弃的汽车、拖拉机、翻斗、矿渣……都视为诗意的在场,这是一个深刻的悖论,语言是语言,存在是存在,这是我们时代最难愈合的重创。因此个旧城有点忧郁,有点不知道如何是好。青山翠谷以及偶尔穿越的山鹰包围这堆钢筋水泥,人们可以想象李白杜甫们咏过的落日如何在高山边缘徘徊,但眼前反常地、过早降临的灯红酒绿的夜晚是水泥峡谷的杰作。

那个小动物园还养着几只孔雀,有一只飞到了附近一栋七十年代建造的居民楼前的波形瓦上,出现在它的祖先从未抵达过的地方,就像一位月球上的飞行员,它试图在这不毛之地找出些食物。它走來走去,张望,又低下头,就像费里尼电影里面的某个镜头。

并没有得到上司的认可。于是,我改变了方式,那天,办公室人比较少,我走过去对她说:“最近怎么样?随便聊聊好吗?”她来到我的办公室,详细地描述了她承受的工作压力,还对公司运作上的一些问题提了很好的建议。我感

觉她放松了许多,显然,用一些开放式的问题容易启动谈话,有助于缓和对方的紧张情绪。

如果你的下属要用英语作会议发言,他嫌自己的英语不够好而感到紧张。千万不要说“冷静一点”、“不要紧张”之类的话,而要允许他发言时看笔记,鼓励他发言时不时地稍作停顿和与会者眼神交流,甚至可以喝水,也可以和同事说点笑话。降低发言者自身的期望值会大大缓和他的紧张情绪。

有一种情况是亲人之间的宽慰,那可能真的是希望亲人不要太紧张。比如说某日我在亲友家中看到如下的一幕:亲友夫妇在一边准备晚餐,一边收拾房间,夫人赶着要在晚饭前把衣服洗了,做这做那很紧张。他们11岁的女儿乖巧地对妈妈说:“妈妈,休息一会儿!”她停下手中的活,陪女儿看一会儿电视,喝一杯茶,真正地放松了。女儿的亲情,是无与伦比的缓和良策。

孔雀

于坚文、摄

暗盒笔记之三十三



十日谈

孙中山和近代名人

明日介绍孙中山和蔡元培。

孙中山生于1866年,毛泽东出生于1893年,两人相差了27岁,但是他们却共同经历了中国大革命的洗礼。两位的接触和交往主要集中于国民党改组和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

早在毛泽东考入长沙湘乡驻省中学时,毛泽东就对孙中山赞叹不已。有一天,他在学校墙壁上贴了一篇文章,表示支持革命党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纲领,提出把孙中山请回来当大总统,康有为做内阁总理,梁启超做外交部长。毛泽东后来回忆说:“这是他第一次发表政见”。毛泽东还在学校带头剪掉了辫子。

1919年3月,为欢送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毛泽东第一次来到上海,这时孙中山已经定居在上海法租界寓所。此后,毛泽东又来沪多次,常到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拜访陈独秀。而陈独秀此时已经结识了孙中山等国民党人。

中共三大后,毛泽东开始参与国共合作的具体工作,由此结识了国民党元老谭延闿,还与陈独秀、李大钊等到廖仲恺家谈国共合作问题。1923年6月25日,毛泽东和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以国民党党员身份致信孙中山,建议国民党“在上海或广州建立强有力的执行委员会,以期合力促进党员的活动和广泛开展宣传”。

毛泽东作为湖南代表参加了1924年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还被指定为章程审查委员之一,座位号为39号。他在会议上多次发言,表现十分踊跃,受到了孙中山的重视。孙中山提名毛泽东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并为大会所通过。国民党一大之后,毛泽东被派到国

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

1924年5月5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在上海法租界莫利爱路29号孙中山寓所举行纪念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三周年庆祝集会。毛泽东作为这次集会的组织者之一,忙碌的身影不断地出现在会场花园内。

此后,国民党内部左右派矛盾加剧,毛泽东辞去组织部秘书职务,只领导文书科工作。1924年孙中山自广州北上途经上海时,毛泽东联络罗章龙、恽代英等14人联名致函孙中山,反映执行部经费自八月起即未能照发、近来内部更无负责之人、一切事务几停滞等的情况,要求派员解决,但此时孙中山忙于北上,无暇顾及。同年12月,毛泽东由于积劳成疾,加上国民党右派的

排挤,结束了在上海执行部的工作。在孙中山逝世后,毛泽东从湖南到广州,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一职,直到1926年5月。

毛泽东一直很尊重和崇敬孙中山。他曾回忆:“孙先生是一个谦虚的人。我听过他多次讲演,感到他有一种宏伟的气魄。”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征途中,毛泽东也多次总结孙中山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他曾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在1956年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之时,毛泽东撰文《纪念孙中山先生》,称孙中山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我们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给予孙中山很高的评价。